

关于《随园集外诗》的真伪问题*

耿传友

王英志主编的《袁枚全集》问世后,陈正宏^①、王英志^②、徐国华^③、罗以民^④、赵厚均^⑤、郑幸^⑥、冉耀武^⑦等学者陆续发现了一些该集所未收录的袁枚诗文。从数量上看,《随园集外诗》的发现最惹人注目,全书收诗二百二十题,三百八十四首,相当于袁枚《小仓山房诗集》的十分之一。如果这些诗歌的确为袁枚所作,那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,学界以前对袁枚的一些评价或许要作修订^⑧。《随园集外诗》作为袁枚的佚作已得到学界认可,被收入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^⑨。可是,笔者仔细阅读后发现,《随园集外诗》存在的问题很多,其可靠性尚需重新思考。故略陈鄙见,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探索。

* 本文为安徽大学“211工程”学术创新团队项目成果。

①陈正宏:《〈袁枚全集〉校补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第三辑,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0年。

②王英志:《新发现的一首袁枚佚诗》,《江海学刊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5年第6期;《袁枚书法中的集外诗词九首考释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8年第6期;《袁枚集外手札》,《文献》2008年第3期;《袁枚集外序文二篇》,《文献》2009年第4期。

③徐国华:《新发现的一首袁枚集外诗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5年第1期;《袁枚佚文补辑》,《文献》2010年第1期。

④罗以民:《〈随园集外诗〉考辨》,《文献》2007年第3期。

⑤赵厚均:《袁枚集外诗文二十二则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8年第6期;《袁枚集外书札七通考释》,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09年第3期;《袁枚集外书札十九通考释》,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3期。

⑥郑幸:《袁枚三篇佚文辑考》,《厦门教育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6期;《袁枚佚札四通考述——兼及袁枚、杨芳灿交游考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8年第6期。

⑦冉耀武:《袁枚集外文一篇——兼谈袁枚晚年与吴镇的一段文字姻缘》,《文献》2011年第1期。

⑧王英志:《〈随园集外诗〉的价值》,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11年第2期。此文给笔者启发处颇多。

⑨袁枚:《随园集外诗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40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。

《随园集外诗》署蒋敦复编次。上海大东书局 1920 年初版,1923 年再版,1925 年三版,1926 年四版。各版内容完全相同,藏版者、校勘者均为上海国学研究会。该书所收诗歌有很多与事实存在严重矛盾,不可能为袁枚所作。

1.《随园集外诗》涉及袁枚启蒙老师史中的诗共四首,其中卷四有《举京兆后寄史师》:

海内灵光夕照横,瓣香应共祝先生。眼看朋辈登鳌顶,经授生徒宴鹿鸣。风雨樽前搔首梦,粉榆村里读书声。时人莫笑颓唐甚,自古文章老更成。^①

袁枚乾隆三年(1738)秋举顺天乡试,是年二十三岁^②。如果《举京兆后寄史师》是袁枚所作的话,当作于此年。袁枚《史先生墓志铭》却有如下记载:

枚生七岁,受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于史先生。十二岁,与先生同补弟子员。十九岁,先生卒。三十九岁葬先生于西湖之葛岭,而志其墓曰:先生姓史,讳中,字玉瓚,汉溧阳侯遗裔,为八行世家。^③

袁枚与业师史中同补弟子员,有很多共同的朋友,在史中去世时,十九岁的袁枚同在杭州,袁枚怎能会不知道老师的死讯,在四年后还寄诗给他呢?值得特别指出的是,袁枚《史先生墓志铭》是据其《溧阳史先生传》删节改写,而在《溧阳史先生传》中,袁枚这样叙述:

妻陈氏。有女一人,适徐子俊三。临终,解衣袋中《哭母诗》与枚,曰:“观此为我立传。”^④

足徵史中去世时,袁枚就在跟前。《举京兆后寄史师》决非袁枚所作!《随园集外诗》卷一的《挽史师母戴孺人二十韵》也明显违背事实,据《溧阳史先生传》,史师母为“陈氏”,而非“戴氏”。

2.《随园集外诗》涉及张敬哉的诗有五首,如卷一《戏赠张敬哉同学》(自注:名有虔,同案入学):

红缠绯衫映绮罗,啁鸾听彻六街歌。随肩问讯年相若,尊重三龄老大哥(自注:年十五岁)。

①《随园集外诗》,上海大东书局,1920年,安徽图书馆藏。本文所引《随园集外诗》文字皆据此本。

②方潜师编纂:《随园先生年谱》,王英志《袁枚评传》附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2年,第632页。另参阅郑幸:《袁枚年谱新编》,复旦大学博士论文,2009年。

③袁枚: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五,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274-1275页。

④袁枚:《溧阳史先生传》,《双柳轩诗文集》,清乾隆刻本。参阅陈正宏:《〈袁枚全集〉校补》,《中国文学研究》第三辑,江西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367页。郑幸《袁枚年谱新编》也注意到此处的矛盾。

张有虔的确和袁枚及袁枚的业师史中同案入学,但说他与袁枚“年相若”,是大三龄的老大哥,则与袁枚的多处诗文不符:

其一,袁枚《寄张有虔先生》说:

枚七岁入学,受业史玉瓚师,得识先生。尔时孩提之童,或背书不熟,畏受师嗔;或督课谨严,觊觎客至。每见先生飘然而来,则善气迎人,不特满堂弟子,皆执化人之祛;而史师亦释躁平矜,顷刻有沂水春风之乐矣!枚年十二,又与先生同入泮宫,释奠则辟呬相招,赴试则抠衣逐后,此种光景,未隔前生。……枚钦挹之忱,不能缕述,谨赋五律二十四韵,书之扇头,托令甥卢抱经学士代为寄上,仍求视作当时童子,加教诲焉。^①

从信中看,袁枚是在跟随史中读书时认识张有虔的,张有虔并不属于“满堂弟子”之列,而是史中弟子们在“督课谨严”时的觊觎之“客”,因为如果张有虔来了,老师就会“释躁平矜”,他们可免受责罚。袁枚业师史中比袁枚大整整三十岁^②,作为史中的客人,张有虔与史中“年相若”似更合理,若与袁枚“年相若”,仅大袁枚三岁的话,“求视作当时童子,加教诲焉”这样的话实在是不通的。

其二,袁枚《寄张有虔先生》所说的“五律二十四韵”即《喜晤张有虔先生却寄二十四韵》:

见说先生健,相逢喜欲狂。人间留硕果,天上自斜阳。忆昔垂髫日,常蒙过学堂。抠衣趋典谒,倾耳听琳琅。善谑天花落,深谈麈尾忙。师威因客损,讲席为谁凉。一日同文战,三人列上庠(自注:枚与先生及授业师同入学)。扶看棘闱月,领采泮芹香。簇簇联坛社,纷纷具酒浆。娶媿小童子,追逐丈人行。……^③

从诗意看,袁枚跟随业师史中读书时,张有虔时常作为老师的客人到学堂来,后三人同时入学,这与《寄张有虔先生》所述相同。若张有虔只比袁枚大三岁的话,袁枚怎会写出“娶媿小童子,追逐丈人行”这样不合情理的诗句?换言之,自称“小童子”,而称对方为“丈人”,决非仅差三岁的同学之间合适的称谓。

其三,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九第四十三条云:

杭州张有虔先生,年九十三,皇上钦赐举人。余自幼蒙提携,故求其诗不得。得其子名济川号南皋生者《微雨》云:“无声著林木,有色引莓苔。”《欲雪》云:“风号平野急,云重暮山连。”^④

①袁枚: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四,《袁枚全集》五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71页。

②袁枚《溧阳史先生传》说:“丁未,枚与先生同补博士弟子,时枚年十二,而先生年已四十二矣。”

③袁枚: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二十二,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538页。

④袁枚:《随园诗话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2年,第304页。本文所引《随园诗话》都出自此版本,不再一一注明。

从“余自幼蒙提携”看,这里所说的张有虔与《寄张有虔先生》、《喜晤张有虔先生却寄二十四韵》中的张有虔应该为同一个人。这段文字具体写于什么时间笔者虽不能确定,但对袁枚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,他去世时只有八十二岁,不难算出,张有虔至少比袁枚要大十一岁,而决非三岁。

3.《随园集外诗》卷三有《陪金中丞登龙壁山同健磐叔父作》,节录于下:

书戟森森出城闉,舣舟江上春风春。鼓舟顷刻达前津,舍舟登陆缘水滨。……井桐幕夜毋断断,韶华春色满九垠。

袁枚乾隆元年(1736)五月四日抵达桂林,八月离开广西赴京,他陪金鉉、健磐叔父游龙壁山只能发生在这段时间^①。据薛仲三、欧阳颐《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》^②,乾隆元年五月四日为公历1736年6月12日,而据历法,这一年公历5月5日(农历三月廿五)立夏,即使袁枚一到桂林便陪金鉉登龙壁山,此时也已入夏一个多月,他竟然写出“舣舟江上春风春”、“韶华春色满九垠”这样的诗句,宁非大谬!同卷的《中丞席上言志叠前韵》有“薄暮炊烟起城闉,主人张灯玩芳春”,《隐山六洞偕金十一游白雀一洞》有“今日载阳得春煦,与子探幽穷其穷”,倘若为袁枚所作,也当写于乾隆元年五月至八月袁枚在广西的这段时间里,但从诗意看,它们明显写于春天,同样违背情理。

4.《随园集外诗》卷四《重九日偕新同年集万柳堂有忆故乡诸友兼寄张敬哉》云:

天公亦珍重,放晴到重阳。黄花閤消息,芙蓉迟晚芳。佳辰集盛地,豪气推少狂。万柳摇空翠,来登廉氏堂。纤腰争迎客,风景不寻常。茱萸约高会,天涯各一方。思亲逢佳节,离群感他乡。此地素心侣,笠屐且相望。载酒频征逐,持螯共徜徉。秋风喜获第,歌舞娱遨翔。所谓硯田稔,偶歉而终穰。一载复两载,弹指光阴长。客居自岑寂,唧唧啼寒蛩。低徊怀良雨,惨栗抚清商。旧游既以隔,新知联东墙。诟取疏踪迹,远嫌拟王昌。日月竞流浪,春风移秋霜。俯仰不能已,视天徒茫茫。

乍一看,此诗与袁枚的经历和心境十分相符。袁枚乾隆元年(1736)九月入京,至乾隆三年(1738)秋举顺天乡试,客居北京两年,算得上“一载复两载,弹指光阴长”;适逢重阳佳节,不免会起思亲之念,所谓“离群感他乡”也。可是,《随园诗话》卷十二第四十八条云:“戊午秋,星望公病笃,犹读余闾墨,许为第一。初十日,榜发,余获隽,而先生即于是日委化。”由此可知,本年发榜的时间为九月初十日。袁枚何以能这样未卜先知,在发榜前一天与“新同年”集于万

①《随园老人遗囑》云:“时乾隆丙辰端午前一日也。叔父一见佛然道:‘汝不该来。’我惶恐无措。不料次日引荐金公,蒙国士之知,非常矜宠,留住三个月,保荐博学鸿词,送银一百二十金,遣人办装,护送至京。”(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首,《袁枚全集》二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3年)另参看郑幸:《袁枚年谱新编》,复旦大学博士论文,2009年。

②薛仲三、欧阳颐:《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56年。

柳堂,写出“秋风喜获第,歌舞娱遨翔”这样的诗句?其实,袁枚本年重九这一天的确与友人集在一起分韵赋诗,但地点不是万柳堂,而是忏园,张棟《看云吟稿》卷五“戊午”下《九日陪玉洲夫子暨钱公理,沈椒园,查七伦,袁子才,家少仪,李宁人、开地,傅天忏园登高,得字字》可资证明^①。

5.《随园集外诗》卷二《甲寅元旦上年韵》云:

甲寅元旦启良辰,满眼桃符一色新。弱冠年龄谁道稚,太平时代况逢春。竞芳椒柏随时景,并茂椿萱健在身。聚顺家庭差可喜,韶华惜取写天真。

袁枚生于康熙丙申(1716)三月二日^②,雍正甲寅(1734)为十九岁,“弱冠”一般指二十岁。袁枚怎可能在“甲寅元旦”写出“弱冠年龄谁道稚”这样的诗句呢?类似的问题此前至少已出现过两次。一是卷二的《万松书院》,自注云:“壬子余年十八岁,受知浙督程元章,咨送入院肄业。”实际上,雍正壬子(1732)袁枚只有十七岁,而非十八岁。一是卷一的《入学》(自注:雍正五年丙午科试):

不会文章也秀才,功名迟早有应该。诵诗舞勺浑闲事,还待明年料理来。(自注:年十二岁)

袁枚十二岁入学,这是对的,但雍正五年为“丁未”而非“丙午”。袁枚为什么会屡犯如此让人惊诧的错误?显然不能仅用一时疏忽来开脱,一定另有原因。

6.《随园集外诗》卷三有《读王次回〈疑云集〉二律》。王次回名彥泓,是袁枚喜爱的晚明诗人,袁枚《随园诗话》曾多次提到他,并因沈德潜编选《国朝诗别裁集》未录王次回《疑雨集》而专门去信责问^③。但《疑云集》出现较晚,在光绪之前未见有任何记录,乃托名王次回所作的伪书,实为剽袭、篡改清末俞廷瑛《琼华诗集》、《琼华词集》而成^④。袁枚决不可能读到《疑云集》,写出《读王次回〈疑云集〉二律》这样的作品。

①郑幸:《袁枚年谱新编》。

②郑幸:《袁枚年谱新编》。

③参看拙文《艳诗该如何对待——由袁枚、沈德潜之争谈中国艳诗的历史命运》,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11年第4期。

④参看拙文《王次回〈疑云集〉辨伪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6年第4期。颇有趣味的是,《随园集外诗》后有一则卖书广告:“《王次回〈疑云集〉》,全二册,价洋六角。此为江右易氏抄本,于光绪初得诸王氏裔孙,乃经挚友商诸易氏,以二百金之书籍易之。翻阅一过,讹夺繁多,穷十昼之功,始得校正就绪。爰付精印,以共同好。”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:既然《疑云集》易自“江右易氏抄本”,而“易氏抄本”于光绪初得诸“王氏裔孙”,那么袁枚所读的“王次回《疑云集》”从何而来?造假者或许认为编造袁枚《读王次回〈疑云集〉二律》,既能证明《疑云集》的可信,又能暗示《随园集外诗》的真实,但不经意间却露出了作伪的马脚。

《随园集外诗》所收诗歌有很多涉及袁枚的亲属,大都不合情理,不可能为袁枚所作。

1.《随园集外诗》卷一有《秋夜同树弟机妹读》、《人日侍亲挈弟登吴山》、《长夏无俚同弟妹分诗品句为题存六首》。《随园集外诗》首篇《童戏四咏》自注云“八岁作”,末篇《离溧水任车中感成》作于二十七岁,中间具有时间线索的诗歌大体以时间先后排列。如果《随园集外诗》的确为袁枚所作的话,那么,按时间顺序推断,该书卷一中的诗歌大约作于袁枚十六岁之前,《秋夜同树弟机妹读》当作于袁枚十二岁左右^①。袁树生于雍正九年辛亥(1731),小袁枚十五岁;袁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(1720),小袁枚四岁^②。以此测算,袁枚写《秋夜同树弟机妹读》时,袁树、袁机皆没有出生。《随园诗话》卷十第三十五条云:

香亭弟随叔父健磐公,生长广西,叔父亡后,余迎归故里。年十五,即见赠云:“坐无尼父为师易,家有元方作弟难。”又,《即目》云:“山气腾空欲化云。”余早知其能诗也。

由此可知,袁树在广西长大,十五岁时才被袁枚迎归故里。袁枚、袁树、袁机他们兄妹天各一方,在袁枚三十岁之前根本不具有在一起读书的可能^③。袁枚是家中的唯一男孩,袁树是袁枚的大堂弟,袁枚在十六岁之前同样不可能写出《人日侍亲挈弟登吴山》、《长夏无俚同弟妹分诗品句为题存六首》这样的诗歌。

2.《随园集外诗》卷一有《春兰改机妹作二首》、《又和韵二首》,前者诗后有注:“时有为妹作伐者。”袁枚的父亲袁滨为如皋人高清伸冤,高清弟高八无以为报,愿以其妻腹中子为袁滨女婿。于是,袁机未及周岁便被许为高八尚未出生的儿子,高家“寄金锁以为礼”。因袁机太小,袁枚“代系金锁饰项者数年”^④。对袁家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晓此事,怎会有人给袁机做媒呢?既然《秋夜同树弟机妹读》已确定不可能为袁枚的作品,那么,《春兰改机妹作二首》、

①王英志:《〈随园集外诗〉的价值》,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11年第2期。

②郑幸:《袁枚年谱新编》。

③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六《与家弟香亭、陆甥豫庭居随园,仿昌黎〈符读书城南〉诗作二首,劝其所学》其一“示香亭”云:“我昔见弟时,弟才离襁褓。弟今见我时,弟年如我小。兄为西湖鱼,弟为粤西鸟。相去万里余,相别十年杳。兄弟记从前,大家难了了……”(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14页)。所谓“我昔见弟时,弟才离襁褓”当指乾隆元年(1736)袁枚前往广西之事,据此以“相别十年杳”计之,二人重逢当在袁树扶柩归来之际。参看郑幸:《袁枚年谱新编》。

④袁枚:《女弟素文传》,袁机《素文女子遗稿》卷首,《袁枚全集》七《袁家三妹合稿》。

《又和韵二首》也决非袁枚所作。

3.《随园集外诗》卷三有《七夕次棠妹韵》。袁棠为袁枚的叔父袁鸿之女，袁树之妹，小袁枚十七岁^①。以这首诗在《随园集外诗》中的位置，其应作于袁枚十八岁前，而此时袁棠可能还在母腹中，兄妹二人怎可能在一起次韵赋诗。而且，袁棠生于桂林，十二三岁时才被袁枚迎归故里，在此之前只有乾隆元年（1736）袁枚省亲广西时^②二人才有见面的机会，而此时袁棠也只有四岁，袁枚同样不可能和她次韵赋诗。

4.《随园集外诗》卷三有《喜豫庭甥至》，节录于下：

依依甥舅渭阳谊，相见晨昏等闲事。胡以云天怅两地，令人频寄相思字。吾甥行境与人异，俯仰古今频高寄。……清酒一尊同不睡，不饮已决心神醉。康公自出本同类，促膝深谈奚所寄。万语千言累复累，三更霸月从天坠。

豫庭即袁枚二姊之子陆建。陆建与袁树同岁，小袁枚十五岁^③。以这首诗在《随园集外诗》中的位置，其应作于袁枚十八岁左右，而此时陆建只有三岁上下。一个三岁小孩“俯仰古今频高寄”已有些不尽合理，尤其不可思议的是，袁枚竟会和他“促膝深谈”，以至“万语千言累复累，三更霸月从天坠”，宁非大谬？

5.《随园集外诗》卷二有《戈小莲妹婿自吴门来，一日即别去》二首。其一云：

惻惻长相忆，其来乃不期。高堂夸健饭，弱弟解哦诗。春树迷吴下，行装感路歧。论文倘不寐，惟有酒盈卮。

戈小莲确有其人，袁枚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四第四十七条云：“吴门戈小莲培，吾家侄婿也。诗笔清矫。”可见戈小莲为袁枚侄婿而非妹婿。这或可强解为书写错误，但如果此诗确为袁枚所作，当写于他十八岁左右，上文已述及，袁枚是家中的唯一男孩，袁树是袁枚的大堂弟，此时只有三岁，袁枚侄女尚不知在何处，哪来的侄婿？何况此时袁树尚在广西，“弱弟解哦诗”又从何谈起呢？换言之，袁枚在十八岁左右时，根本不可能写出《戈小莲妹婿自吴门来，一日即别去》这样的诗。

①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十一《女弟〈盈书阁遗稿〉序》云：“庚寅夏五，女弟秋卿以婉难亡于汪氏。……妹为叔父健磐公第四女，生长粤西。余归叔丧于杭，始见妹。……妹虽一女子，虽死有可传者存，夫复何悌！独是余年届大董，妹年才三十八耳。”（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，第1388-1389页）“庚寅”袁枚五十五岁，袁棠三十八岁，则两人相差十七岁。

②郑幸：《袁枚年谱新编》。

③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六《与家弟香亭、陆甥豫庭居随园，仿昌黎〈符读书城南〉诗作二首，劝其所学》其二“示豫庭”云：“汝父气奄奄，呼姊申遗诫：‘我有两孤儿，麻者居其大。属猪才扶床，属兔未能话。凉难自成立，惟尔弟是赖。’……忽忽十九年，冠礼行将届……”（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，第115页）此诗系于乾隆十四年，逆推十九年，则陆建生于雍正九年，本年为辛亥年，与“属猪”之说吻合。另参看郑幸：《袁枚年谱新编》。

以上主要论证了《随园集外诗》部分作品的不可信,现在再讨论《随园集外诗》的来历问题。《随园集外诗》最早出现在1920年,在此之前,未见有这些所谓袁枚佚诗的任何记录。该书署名蒋敦复所作的序文,说明了这些所谓袁枚佚诗的来龙去脉。此序罗以民《〈随园集外诗〉考辨》已全文逐录,此处不赘。

蒋敦复(1808-1867)字剑人,又字子文、纯甫、克父等;号江东老剑,又号丽农山人。江苏宝山(今属上海)人。多次赴乡试皆落第,晚年客应宝时幕,卒于幕中。曾问学姚莹,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,工古文诗词,著有《啸古堂文集》、《啸古堂诗集》、《芬陀利室词集》、《芬陀利室词话》等^①。粗略看来,蒋敦复的序似乎是可信的:信中提到的袁祖德(又村)、袁祖志(翔甫)的确为袁枚之孙,“敏斋方伯”即应宝时,也实有其人。但是,蒋敦复《啸古堂文集》没有收录这篇序文,序文本身也存在若干可疑之处。

1.同治三年春,蒋敦复并没有应“敏斋方伯之招”入其幕中。

应宝时《〈啸古堂文集〉跋》云:

丽农山人,余二十年前诗友也。初与胡鼻山人同遇于海上,琴尊跌宕,意气纵横,致足乐也。比余宦游此邦,尚得与山人订官谱,搜异志,说鬼谈天,以抒发其胸中不平之蕴。迨山人客余幕中,虽亦就访时政,每助余诘强邻之难,剔巨魁之奸,然必数日甫得一面,相见又不过数语,欲如往昔之送抱推襟,流连光景,不可得矣。不一年而先生歿。^②

从这段跋语看,蒋敦复客应宝时幕后“不一年”而歿,而蒋敦复同治六年卒于上海,这就是说他在同治五年才应应宝时之招,入其幕中。应宝时与蒋敦复关系密切,又是当事人,他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。那么,蒋敦复怎可能在同治三年春写出“岁在甲子,余应敏斋方伯之招,乃得与明府弟翔甫相见于幕中”这样的文字呢?

2.序中称应宝时为“方伯”,与多处史料的记载不符。

其一,李鸿章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的奏折《洋弁请奖片》云:

前据英国公使威妥玛将帮同戈登打仗,各洋弁开单交由总理衙门知照到臣,当经飭据苏松太道丁日昌、通商随员候补知府应宝时会同戈登及总税务司赫德悉心查核,大致相符,并据英领事巴夏礼面称,翻译官梅辉立等有功绩。^③

①滕固:《蒋剑人先生年谱》,沈宁编:《挹芬室文存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3年。该谱原载1933年《图书馆学季刊》第9卷第2期。

②应宝时:《〈啸古堂文集〉跋》,《啸古堂文集》附,清同治七年刻本。

③李鸿章:《李鸿章全集》2《奏议二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8年,第18页。

据《清史稿·职官志》，知府为从四品，方伯为布政使的尊称，为从二品^①。同治三年春，应宝时只有任布政使或加布政使衔才能被称为“方伯”。应宝时在同治四年正月尚为从四品的候补知府，离布政使品级尚远，未见有加布政使衔的任何记载，蒋敦复岂能在同治三年春称他为“方伯”？

其二，李鸿章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的奏折《奏保李宗羲等片》云：

查有三品顶戴苏松太道丁日昌，广东廉贡，由江西直隶州调营当差，嗣擢海关道。筹办洋务，抚绥商民，实力整顿，不避劳怨，操守亦甚清严。昨因病请假調理，计可就痊。上海洋务，现有通商随员升用道应宝时代理关道，本是熟手，可期措置得宜。又，按察使衔广西补用道程桓生，安徽拔贡……^②

在李鸿章的奏折中，称谓丁日昌时特别提及其三品顶戴，称谓程桓生时专门提及其按察使衔，如果应宝时此时已加布政使衔，李鸿章岂有不提之理？而结合前引李鸿章的《洋弁请奖片》看，应宝时地位比丁日昌要低，在丁日昌因病请假时，应宝时暂时代行职务。既然丁日昌在同治四年八月尚以道员（正四品）着三品顶戴，应宝时又岂能在同治三年春就“加布政使衔”？

其三，杜文澜《憩园词话》云：

应敏斋廉访宝时，永康人。甲辰孝廉，就职州佐。莅江苏，以规画军事，镇抚彝情，屡膺剡章，补授苏松太道。旋擢苏臬，加布政使衔，前后六署藩篆。^③

据《苏州府志》，应宝时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任江苏按察使，同年八月二十二署江苏布政使^④，与《憩园词话》所载相合。假如它们所载不误的话，应宝时至同治八年任江苏按察使后才“加布政使衔”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蒋敦复怎可能在同治三年春就尊称应宝时为“敏斋方伯”呢？

3.袁祖志《随园琐记》未提《随园集外诗》。

序中说“蒋敦复”在同治三年春“爰竭一月之力，补缀成篇，厘为四卷”的《随园集外诗》，乃是袁祖志“出以见示”的。换言之，在袁祖德殉难后，袁祖志正是《随园集外诗》的保存者。袁祖志《随园琐记》提到袁枚的著作时说：

《小仓山房全集》计三十种。《文集》古文也，《外集》骈体也，《诗集》古近体也，《太史稿》时文也，《诗话》也，《续新齐谐》也，《食单》也，《尺牍》也，《八十寿言》也，《随笔》也，《同人集》也，《红豆村人诗稿》也，《三妹合稿》也，《女弟子诗选》也，《捧月楼词》也，《碧腴斋诗稿》也，《何南园诗稿》也，《湄君诗稿》也，《小云诗稿》也，《素文女子遗稿》

①《清史稿·职官志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据百衲本影印，1998年，第452页。

②李鸿章：《李鸿章全集》2《奏议二》，第204页。

③杜文澜：《憩园词话》卷三，唐圭璋编《词话丛编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901页。

④冯桂芬等：[同治]《苏州府志》卷二二，清光绪刻本。

也,《三家词》也,《七家词》也。装订成册,计八十本。每大比之年,任坊间自备纸工,来园刷印,本园每部取板资银一两。全集之由本园出售者,白纸每部价银五两,竹纸每部价银三两六钱。坊间则听其自定价目。每年统销,约在数百部焉。……先大父曾有《州县心书》见之《诗集》中,而此书竟不知流落何所。又有《随园公案》一书,本系他人所刊,坊间贩卖,风行一时;另有编成戏剧如《断蜈蚣》、《断鸡子》、《断芭斗》之类,沿街唱演,殊为可笑。^①

《随园琐记》卷首有袁祖志“自识”,署“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正月”。袁祖志《随园琐记》所记袁枚的著作,不仅袁枚亲著的悉数收入,连袁枚编选的也皆列入,甚至“不知流落何所”的《州县新书》也专门叙及,如果袁祖志真的在同治三年时尚保存有《随园集外诗》中的这些袁枚的佚作,岂有不提之理?

4.《随园轶事》也不可靠。

序中云:“卷首童戏诗裳字来字韵,曾闻明府言之,余已录为先生《轶事》。”按,《轶事》当指《随园轶事》,其真伪同样是个问题。滕固曾为蒋敦复编《蒋剑人先生年谱》,在同治三年(1864)有如下内容:

二月为王昙批本《金屋梦》(即《金瓶梅》)说部撰序,记购得此书之由来。(按书为民国初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;民国十五年上海卿云图书公司出版之《金瓶梅》,亦载此序。)四月序自撰《随园轶事》。(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。)

按《金屋梦》序文暨《随园轶事》系书贾所伪托。闻此等文章,皆为吴兴王文濡所造,王谙熟先生遗事,故可乱真也。《宝山县再续志》编者,竟以《随园轶事》一书,列入艺文书目,陋矣。^②

考虑到《随园轶事》在民国时才出现,之前未见任何记录,滕固的话是需认真对待的^③。

综上所述,《随园集外诗》卷首署名蒋敦复所作的序,可疑之处颇多,自不足信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安徽大学文学院

①袁祖志:《随园琐记》卷上《记著作》,《随园三十六种》,民国二年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。

②滕固:《蒋剑人先生年谱》,第363页。

③笔者另撰有《〈随园轶事〉真伪考》一文,认为《随园轶事》实是杂抄袁枚《随园诗话》、《小仓山房诗集》、《小仓山房尺牍》、《子不语》和袁祖志《随园琐记》等著作而成,而且出于王文濡之手的可能性较大。